

中國文學入論第二種

中國散文概論

中山大學教授
方孝岳 著

目次

本體論

一 散文的含義

二 散文學的演進

方法論

三 字句的格律(上)

四 字句的格律(下)

五 篇章的體裁

六 議論文之體裁

七 儒家的論(上)

八 儒家的論(中)

九 儒家的論(下)

十 從橫家的論

十一 名家的論

十二 魏晉本名家的論

十三 敘事文的體裁(上)

十四 敘事文的體裁(中)

十五 敘事文的體裁(下)

一
二
六
一三
一八
二〇
二二
二四
二六
二八
三〇
三一
三三
三八
三九

中國散文概論

本體論

一 散文的含義

散文本對駢文而稱。散文這個稱號，每是對駢文而稱的。論其本體，即是不受一切句調整律之羈束而散行以達意的文章。如沈約所說：『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宋書·謝靈運傳）論兼詩文而言，柳宗元所說的『駢四儷六，錦心繡口。』（乞巧文）李商隱所說的『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樊南甲集·自序）這些都是駢文所守的規律，散文是沒有這些形式上的拘束的。

散文形式異於駢文之處，原來散文運動之起源，正是針對駢文而生的。散文運動即是唐宋以來所謂古文運動。所以當清朝姚鼐編出一部古文辭類纂，以綜合唐宋以來諸古文家所講求的古文之學，而同時李兆洛即編出一部駢體文鈔，來和姚氏對抗，這即是李兆洛拿他的駢文學來對抗姚鼐的散文學了。所以駢文散文之對立，即是駢文和古文之對立。這是自來一般普通的觀念。再上溯古文運動之起源，韓愈所做的工作，即以力矯駢儷之形式為其宗旨中一個顯而易見之點。他自己在題歐陽生哀辭那篇文章裏說：『愈之為古文，豈僅以其句讀不類於今耶？學古道，故欲兼通其詞。』足見得句讀不類於駢儷之文本是古文形式上先決之點。又唐裴度有一篇與李翱書裏面說到韓愈和李翱師弟間所講求的作風，以為他們是『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故以雄辭遠致矯之。』（見唐文粹）又足見得打破那些聲律羈束一切用散行自然的體勢寫出來，正是古文形式的標準。

散文精神異於駢文之處。至於就內容方面講，古文運動之針對駢文而立義者，乃是以樸實代浮華，以確切恰當的文句代替那些敷衍熱鬧泛濫堆藻典的陳言。本來我們對於任何事物，凡說到一個「古」字，自然都帶了一種天真樸質的意思。樸質而切當情理，即是古文家的中心標準。韓愈曾提出他的正式主張，說「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躋」，（樊紹述纂註銘）文從字順即是樸質，各識職即是切當情理。總而言之，對駢文之形式而言，則稱散文。對駢文之精神而言，則稱古文。清梅曾亮說：「駢文如俳優登場，非絲竹金鼓佐之，則手足無所措。其周旋揖讓非無可貴，然以之酬接，則非人情也。」（復陳伯游書）又管同也說：「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梅曾亮管異之文集書後引）這都是指斥駢文的精神方面而見古文的特色。

向來較論駢散文的議論，自來也有不少的駢文家，站在駢文的立場上，較論駢散文性質。我們就這些人所較論的來看，更可以顯出散文的特性。宋朝羅大經鶴林玉露裏引周益公的話，說「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到了清代，那些駢文家尤愛較論駢散，如孔廣森答朱滄湄書說：「六朝文無非駢體，但縱橫開闔，一與散文同。」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說：「散文可踏空，駢文必徵實。」劉開與王子卿書說：「文之有駢散，如樹之有枝幹。」這四個人當中，周益公（即周必大）和孔廣森是認識散文的好處，而謂駢文中也有這種好處。那末，我們大可以就他二人的話下個轉語，即有駢文固亦能如散文以渾融有味縱橫開闔見長，散文豈非本來更以渾融有味縱橫開闔見長。此外，袁枚的話，是有點抑散文而揚駢文的神氣。但是我們也可以說，袁枚所謂散文之踏空，正是散文家所主張的去陳言（韓愈所說「惟陳言之務去」）最末，劉開是主張駢散二者不可偏廢。他認駢體是枝，散體是幹，但我們又可以說，樹木固兼需枝幹，然而枝無幹不能生，幹無枝還可以存立，這正是駢體和散體的重要區別。

二 散文學的演進

散文學大明於唐宋以後。散文之學，自唐朝韓愈柳宗元以後纔有塗徑可循。本來散文是自古有之，但古時人不談文術，也無所謂駢散之別。至於救六朝駢儷文之流弊，取法古時崇尚質樸之文，開啓途術，自成一學，爲此後千餘年之效法，乃是韓愈所倡始。所以說散文之學開自韓柳以後，並非說散文起於韓柳。

有人說，魏晉的時候，不是有文筆之分嗎？那時候的人所說的筆，似乎應當作散文看。我們較論散文的文術，豈不應該從這個文筆之分爲起點嗎？這個話我以爲不然。魏晉人所說的文筆之分，即是詩賦和雜文之分。魏晉六朝的雜文，皆是駢儷之體，人所共知，正是韓愈所要救敝的。其習於駢儷的句調，當然不是散文。況且那時候普通所認文筆之分，以有韻無韻爲標準，那個標準，即不適於區分那時候的文筆。劉勰《文心雕龍·總論》篇裏，已在另一意義中加以駁斥。蕭統《文選》也並收詩賦雜文而統謂之文。蓋魏晉之筆，雖不拘於句尾押韻，而通體字句之調和音律（即《文心雕龍·聲律》篇所說的音和及上引沈約所說浮聲切響兩句異韻那些話）也算是有韻。簡單說來，本來文和筆在文學體統上，是未嘗不可以分開的，但魏晉六朝的文和筆，實在不容易分開。再就內容方面講，在韓愈提倡古體散文的眼光裏看來，魏晉六朝的筆，都是『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這是韓愈《送孟東野序》裏的話，他這幾句話是兼對六朝的詩和文的批評。）所以他就發起起衰救敝的運動，而建立了後世所謂散文學。就韓愈的意思看來，即是因爲六朝人的觀念，多把六經子史『立意爲宗』的筆除開，而專注意於『沈思翰藻能文爲本』的筆，如蕭統《文選》序裏所表現的，已經發生不少流弊，所以他要加以救濟；他的救濟方法，正是專以立意爲宗來改革那些沈思翰藻能文爲本的習氣。即照前面所引周必大和孔廣森的話來講，雖然六朝駢文，亦能渾融有味，開闢動盪，但是能如此者未必十分多，所以這樣看來，我們自不能混魏晉之筆於唐宋以後所謂散文了。

有人又說，魏晉之筆固可不論，但前面不是說散文自古有之麼？那末，應當以先秦盛漢爲法度之始了，何必說散文之學起於韓柳以後呢？我又回答他說，你這話誠然不錯，我這書下半部方法論中所舉種種方法，正是

處處上溯先秦盛漢而立論，並且還是詳於古先而略於後世。但是我們要知道，以先秦盛漢爲法度之始，正是韓柳等所大聲急呼特別提倡使人注意的。古時候本無專論文術的話，經典古籍中，雖偶有一二近於建立文術的話，但都說得狠渾括，而且雜有其他方面的意義，不可以一端論。至於明定塗術開啓戶牖有階有梯使散文學者有軌道可循，乃不能不推韓柳爲首功。他們的散文學所取法的，固完全是先秦盛漢，而先秦盛漢何以能爲法度之極則，則非借徑於他們所說的話，無從獲得明確的認識。換句話說，散文方法，非經他們詳細指點出來，即無從得有嚴格的依據。像東漢王充論衡裏，也主張樸實明曉的文章，但他的話多嫌籠統單調，他自己的文章，也嫌煩冗零碎，實不能建立正確的散文途徑。他在論衡裏說：『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荻露爲通，文字與言同趣，何爲猶當隱閉指意，深覆典雅，唯賦頌耳。』這一類話，主張散文樸實明顯，本說得極透徹。但只知樣質而不知講求切當，仍有毛病。徒任筆直寫，而不顧說的話是否切當而有力，一片膚詞泛語，雜亂煩冗，那又何能動人觀聽呢？王充自己文章之煩冗瑣碎，正因爲這個緣故。韓愈說：『文從字順』，又說：『各識職』，所以最爲圓滿了。總而言之，先秦盛漢六經子史的文章，除開詩一部分，無一非散文的好模範。但自來都認爲先秦盛漢之文是文成法立（參看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序語）所謂文成法立者，即是無法以告人，至於唐宋諸家乃是有法以告人了。有法以告人，所以散文之學，就從他們建立起來。據唐宋之有法，以上求先秦盛漢之無法，即是我國散文學的軌道。所以說散文之學，是大明於唐宋以後的。

散文學發展經過之略況 現在提起散文學的歷史，即大略如下。新唐書文藝傳裏說：『高祖太宗，大難初夷，沿江左餘風，綺句繪章，揣合低昂。元宗涵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樸點浮。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播騰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魏晉，上軋漢周，唐之文完全爲一王法。』又在韓愈傳贊裏說：『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刻以樸，剗僞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恣肆。』又清方苞在所編的古文約選序例裏說：『自

魏晉以後藻繪之文興，至唐韓愈起八代之衰，然後學者以先秦盛漢演辨理論事實而不蕪者爲古文。』以上數段，足以說明韓愈等所倡導的工作了。至於韓愈所提出的散文規矩，爲自來散文家所奉爲金科玉律的，即是『文從字順，各識職，』『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惟陳言之務去，』『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本深末茂，形大聲宏，行險言厲，心醇氣和，體不備不可爲成，人辭不足不可爲成文，』『那些話。到了宋朝，歐陽修得韓愈文集於漢東李氏（歐陽修書韓集後）因復倡古文，以改革五代的風氣。宋史文苑傳所說，『歐陽修以古文倡，王安石蘇軾曾鞏和之，』就是他們的工作。從此歷元入明，有唐順之歸有光茅坤等，力排明七子偽古之體。明史文苑傳所云，『唐順之輩文宗歐，曾歸有光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又是他們的工作。到了清代，說到散文運動之有力者，普通自會想起方苞、姚鼐，那些人了。方苞主張辭理皆是之清真雅正（見古文約選及四書文選諸序例），姚鼐也說，『文無所謂古今，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之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見古文辭類纂序目）這就是他們所注意之點。都是韓愈以來諸大家的共同主張。此外，古今能做散文和闡發散文途徑的人，自然是很多的。我現在不過略舉途術，明確易知，易從爲人所共曉的，略溯其源流，其他則治文學全史的人多已知道，不是本書狹範圍所能該括，茲姑不論。

方法論

三 字句的格律(上)

『文從字順各識職』即是字句之惟一格律。我們講求文章的道理，必先講方法，方法上第一要件，即是字句之格律。本來就作者方面說，必定要以立意爲先，然後達之於篇章字句；斷沒有毫無立意而能勉強連綴字句以成文的。但在讀書者方面說來，必先循字句以觀其篇章，由篇章以得其命意，也斷沒有對於章句字義還未曾知道，而可以自謂得作者之命意的道理。自來論散文藝術的人，沒有好過韓愈的了。他的話最能兼該本末。關於做文章的基礎道理，他自然說得很多；對於字句的格律，即從他所說『文從字順各識職』那句話裏面，也可以獲得極明白的軌道。

先秦盛漢經典名作最能滿足這種條件。韓愈本著這個條件去上求師法，認爲只有先秦盛漢經典子史那些偉大的作品，是最能文從字順各識職的。六朝的文字，就不能合這個條件。所以在他的答劉正夫書裏說，『文宣師古聖賢人』底下又接着說，『師其意不師其詞』，又說，『文無難易，惟其是耳』。他所謂『文無難易惟其是耳』，即是說古大家的文章做得或艱深，或平順，都有他必然的道理，都是『各識職』。我們須隨處推求他們一字一句所以能够『各識職』的原理，拿這個原理，應用到我們自己做文章的時候，即是『師其意不師其詞』的方法。六朝的文章，他認爲不能文從字順各識職，所以就說他們『亂雜而無章』。而他自已入手初做工夫的時候，也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了。（答李翊書）

我們現在就本著韓愈取法六經的觀念，來研究六經中的字句。本來六經之文所以能够永遠不朽，固然因爲內容道理好，但也因爲文章構造之精。六經的文章一字一句都有萬牛莫挽之重，後世人無論怎樣力追，都

不容易趕上。推求所以然的道理，即因六經之文，沒有一個字，不是合於義之至安理之至順。後世文人，雖號爲工於選詞造句的人，但拿他和六經一比較，都不免近於苟且命筆了。

究竟何謂格律？但我下文所引證的，並非和馬氏文通那一類的書所討論的相同。因爲那一類的書，比附西人文法，雖略可爲修詞之助，但和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散文格律性質不甚相同。拘拘於文法之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出文章來，未必能辦到樞心貴當的地步。我們所說的散文之學，雖確有其格律，但這種格律實是一種抽象凌空的東西，並非畫有一定的框格。大概融貫前人的作品，得文義之至安，自然可以獲得一種自然天成的格律。作文章的人，藉文字以表達胸中的意思，和行遠者藉舟車以達目的地，是一樣的道理。行遠者以得達目的地爲主，至於沿途所藉的舟車，有時大船，有時小艇，有時火車，有時人力車，隨地從宜，在沒有一定的成例當中，自有其一定的成例。文章藉字句以達意，亦是有因地制宜無格律之格律。

這樣講來，所謂字句之格律究竟是什麼呢？我明白地回答說，即是上文所謂『無一字一句不是義之至安理之至順』那句话。換句話說，凡因達意而選詞，選辭必以確能運載吾意以出而使讀者入耳而動於心者爲主。凡因述事而選辭，選辭必以確能運載吾所欲指之事物以出而使讀者栩栩然如身歷其境者爲主。大概立意既定，於是詞句之或曲或直或順或逆，無往不合於職分之當然，這就是文從字順之至軌。

六經之字句 前人論六經文字的人很多，我現在擇取數種條理精密能抉發六經的詞致所以最爲精美的緣故的話，列舉在下面。

唐朝孔穎達注尚書堯典裏『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那幾句話，他說，『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己及物，故先恭後讓，名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於天地，向上向下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宜先及於人』。清朝戴東原對於尚書裏這幾句話的文義，也曾有討論。戴氏文集中，有一篇與王鳳喈書，裏面說：『橫四表格上下對舉也。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

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我們看孔戴二氏所舉這個例子，知道尚書裏的措意遣詞，有這樣的嚴密。

明末王船山有論詩經文句的話，他的詩經稟說，『蘇子瞻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體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固也。然得物態，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葉蓁蓁，灼灼其華，有實其實，乃窮物理。夭夭者，桃之穉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則液流蠶結，花不榮，葉不盛，實不蕃。小樹弱枝，婀娜妍茂爲有加耳。』這雖是論詩，但就字句而言，也可爲散文家尋求詞理之助。

至於專著一書較論六經字句的，有宋朝的陳騭。陳騭著有文則一書，專論此事。他說：『辭以意爲主，故辭有緩急輕重，皆生於意也。韓宣子曰：吾淺之爲丈夫也。』左傳襄公十九年，則其辭緩。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則其辭急。狼躡於是乎？君子，左傳文公二年，則其辭輕。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論語則其辭重。』又說：『詩書之文，有若重複而意實曲折者。詩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鄘風簡兮，此思賢之意，自曲折也。』又說：『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商頌那，此考古之意，自曲折也。』又說：『書曰：眇眇予末小子。』顧命，此謙托之意，自曲折也。』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此告戒之意，自曲折也。』又說：『文有意相屬而對偶者，如發彼小豕，殪此大兕。』小雅吉日，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大雅抑，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禮記禮運，又說：『文有事相類而對偶者，如威侮五行，息葉三正。』尚書甘誓，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尚書仲虺之誥，此皆渾然而成，非有意於媿配。凡文之對偶者，若此則工矣。』又說：『夫文有病辭，病辭者，讀其辭則病，究其意則安。如曲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繫辭曰：潤之以風雨，蓋禽字於猩猩爲病，潤字於風爲病也。』陳氏所說，都是發明六經的字句上，無論是常態或變態，無往不是辭意交融訴合無間，有不可以常律論之妙處。

又清代俞樾有古書疑義舉例一書，提出經典中所有異於後人行文之法的文句，分類編列出來，尤足爲考求經典字句的幫助。其實所謂異於後世行文之法者，都是意之所到，不得不然，關於上下文義者至多。我們看

他所舉的，可以知道，凡藉文字以達意，實是變動不居，沒有死板的定格，而但以達到言以足志之目的而止。而文才有高下，實由於用意有淺深罷了。我們先玩味文句之異同離合，但期爲啓發的材料，並非欲揣合低昂，步趨於詞氣語勢之間。茲節取俞氏書中最有裨於文義者，條列於下：

『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例：魏二年左傳以秦馬牛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並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按此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之證。使後人爲之必一一爲之辭曰：以秦馬百匹，牛百頭，曰沽酒不飲市脯不食，此文之所以日繁也。』

古人行文不嫌繁複。例：孟子梁惠王篇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離婁篇：晉視底穰而天下化，晉視底穰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兩王之不王，皆視底穰若省其一證之便索然矣。

語急例：古人語急則有以如爲不如者。隱元年公羊傳：如勿與而已矣。注曰：如卽不如，是也。有以敢爲不敢者，莊二十二年左傳：敢辱高位，注曰：敢不敢，是也。

語緩例：古人語急則二字可縮爲一字，語緩則一字可引爲數字。魏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葺牆以待賓客，急言之則止是葺牆以待賓客耳，乃以葺上更加繕完二字。

兩人之辭而省曰字例：有兩人問答，因語氣相承，誦之易曉，而曰字從省不書者，如論語：陽貨篇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居吾語女，乃夫子之言，而卽承對曰未也之下，無子曰字。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女安則爲之，乃夫子之言，而卽承曰安之下，無子曰字。

文具於前而略於後例：梁九年梁傳：梁亡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酒不足道也。范注曰：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酒不足記也。按上文已備列梁所以亡之故，使下文必一一言之，則累於辭矣，故曰酒不足道，止一酒字該之，具於前而略於後也。

文沒於前而見於後例：微子篇我祖契，遂陳於上，我洗酺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按底遂陳於上，蓋以德言。紂所亂敗者，卽湯所底遂而陳者也。德字見於後而沒於前，微傳不達其義，乃曰致遂其功，陳列於上，則上句增出功字矣。又詩生民篇：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按后稷所以見棄之故，千古一大疑案，而不知詩人固明言之，蓋在后稷呱矣一句。夫至鳥去之後，后稷始呱，則此前此者未嘗呱也。凡人始生無不呱呱而泣，后稷生而不呱，於是人情駭怪，貪欲棄之於隘巷，於平林於寒冰，愈棄愈遠，亦愈險，聖人不死，昭然可見，而后稷亦既呱矣，遂收而養之，命之曰棄，志異也。詩人歌詠其事，初不言見棄之由，蓋沒其文於前而著其義於後，此正古人文字之奇也。後人不達而異義橫生矣。

蒙上文而省例：定四年左傳，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此文奔字一字爲句，言楚人奔也。食而從之四字爲句，言吳人食楚人之食，食畢而遂從之也。奔上常有楚人字，食而從之上，常有吳人字，蒙上而省也。

探下文而省例：夫兩文相承，蒙上而省，此行文之恒也。乃有逆探下文而預省上字，此則於例更變，而古書亦往往有之。楚與齊生三十微庸，三千在位，五十載。因下句有載字，而上二句皆不言載。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因下句有徹字，而上二句皆不言徹，是探下文而省者也。

舉此以見彼例：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以古書之文往往有舉此以見彼者。顧氏與武曰：知錄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先王居櫛於四裔，不言渾敦，劉奇鑒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以大名冠小名例：荀子正名篇曰：物也者，大共名也，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是正名百物有共名別名之殊。乃古人之文，則有舉大名而合之於小名，使二字成文者，如禮記言魚鮪魚其大名，鮪其小名也。左傳言鳥鳥鳥其大名，鳥其小名也。孟子曰：草芥芥其小名，草其大名也。

舉小名以代大名例：詩采芣芣，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三秋即三歲也。歲有四時而獨言秋，是舉小名以代大名。漢書東方朔傳，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三冬亦即三歲也。學書三歲而足用，故下云十五學擊劍也。注者不知其舉小名以代大名，乃泥冬字爲說，云貧子冬日乃得讀書，失其旨矣。

實字活用例：宣六年公羊傳，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上門字實字也，下門字，則爲守是門者矣。國九年左傳，門其三門。下門字實字，上門字則爲攻是門者矣。執持於手，即謂之手。莊十二年公羊傳，手劍而叱之，懷抱於腹，即謂之腹。詩裴我篇，出入腹我是也。又以女妻人，即謂之女，以食人，即謂之食，皆此類也。

語詞複用例：古人用助詞有兩字同義而複用者。左傳，一簣一簣，十年尚猶有臭，尚即猶也。禮記，人喜則斯陶，斯即則也。此顧氏與武說。何謂之庸何文十八年左傳，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挾汝庸何傷。庸亦何也。此王氏引之說。尚書秦誓篇，尚猶詢茲黃髮。言尚又言猶。禮記三年問篇，然後乃能去之，言然後又言乃。

上下文變換虛字例：古書有疊句成文而虛字不同者。尚書洪範篇，水曰洿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上四句用曰字，下一句用爰字，爰即曰也。論語富貴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上句用而字，下句用如字。孟子離婁篇，文王親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上句用如字，下句用而字，而即如也。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上句用乃字，下句用而字，而即乃也。反言省乎字例：監訟可乎，乎字已見於楚典，是書未嘗不用乎字。然乎者語之餘也，讀者可以自得之。古文往往有省乎字者。尚書西伯戡黎篇，我生不有命在天，史記則此句末有乎字。呂刑篇，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史記作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乎。句尾用故字例：凡經傳用故字多在句首，乃亦有在句尾者。禮記禮運篇，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故字在句尾也。

俞氏的話詳盡如此，凡古經之奇辭秀句，幾乎是攬勝不窮了。但是俞書原意，實資經生今取論文，乃是借徑因爲他止疏其例，而未釋其理，固有待於補說。凡辭致之輕重順逆繁省，皆有其必然之故。茲舉一例言之，可以隅反。例如俞氏說尚書：西伯勘黎，我生不有命在天下省乎字。實則此句必須如此亢聲而止，決不可緩乎字，紂之剛愎拒諫之神始可表見。若加乎字，即將語氣改較紆緩，似乎紂有危懼之情了。史記加乎字以求顯豁，而實失去原文之美。凡文字之美，蓋皆以時以地而各有所擅，有因通譯而違真，轉述而失意者。古今中外之隔，此例甚多。明朝王世貞藝苑卮言裏說：『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修，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揚雄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俱非聖人意也。』我們看世貞的話，可以知道讀經者，應求其辭理之所以然，而不可強爲增減字句，以合後人之心。學文者，應沈潛於其言之所足者爲何志，而不可揣合低昂，強步趨於神態之間了。

總起上面幾個人所說的看來，如孔穎達戴東原所論之尚書，王船山所論之三百篇，是學者聞之而即可行的。陳騭之文，則俞樾之舉例，則學者聞之而尚須濟以思考的。因孔戴王氏所論，在於辭理之精切，辭理之精切，是第一必要的條件，有聞斯行，是人們所比較易做的。陳俞所論，在其變化無方之例，變化無方者，非常例之所必然，我們務必見而思其故了。總而言之，文章字句之格律，終不出此二種。由孔戴之說以遵其常，由陳俞之說以窺其變。又陳俞之說雖同，而俞舉其例，陳則頗能闡發其理，學者執理以馭其例，則所謂變化無方者，仍是精切恰當之一類。這樣講來，字句之格律，終無他奇，爲常爲變，都以各識其職爲主罷了。

劉知幾所評史記漢書之字句，六經以後，文家所仰慕的，不待言又是以馬史班書爲斗極了。但是唐朝劉知幾乃有點煩之作。他認史記漢書頗有煩冗的字句，可以刪去。此正吾人商討字句格律之良資。清朝方苞也曾經說過：『易詩書春秋及四書一字不可增減，文之極則也。降而左傳史記韓文，雖長篇，字句可薙芟者甚少，其餘諸家，雖舉世傳誦之文，義枝辭冗者不免矣。』（古文約選序例）所以他的古文約選，既於唐宋諸家文句，

每有鈎畫，以表可削之處，又復有刪點澆書及柳宗元文集之作（此二書，但有故家傳錄之，本未有雕版，又其左傳義法舉要於左傳文亦有一芟蕪之段。凡此皆商討字句格律者可貴的材料。

史通點煩篇在現在所傳的本子裏面，文多脫誤，或多非知幾原意，今節取二段文義較為明顯可以見其刪改之用意者如下。

其刪改史記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史記原有策字）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史有兵字）送東園鄒郗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鄴陰，王使客將軍漸逵聞入鄴，鄒固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愈固趙者前與齊酒（史衍下同）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號（史無號字）今齊漸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鄒郗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史衍）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史有仲字下同）逵適遊趙會秦園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魯逵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於外今又內園鄒郗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漸逵在吾請（史作且）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逵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逵先生齊（史有國字）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逵先生平原君曰：勝（史有既字）已決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園城之中者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史有久字）居此重園（重園史作園城）之中而不去魯逵云云。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逵魯逵辭謝者三（此四字史作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逵壽云云。

又刪改漢書王孫卿傳曰：「上遣使者徵王孫卿王生請（漢書原作願）從功曹以為王素著酒無節度不可使遂不聽。（應字漢書作忍逆二字）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自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上前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漢書有言字）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

我們看知幾所刪改，全注意於辭句之簡潔，力避疲緩渾滯重複或前後衝突之病。大抵文章律法，後密於前；然古時之文，實多有不修邊幅之美。知幾所改，不足為史漢病，但從他所改的看來，固未嘗不足為修辭簡潔之

助。所以浦起龍加以解釋，說『河東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夫潔非瘦削之謂也，劉子則以削爲宗。然當六朝塗澤之餘，從未有此辣手刮世眼者，故是韓柳輩先驅也。太史公雜取羣書，疊見複出，古趣自流；尋行數墨，大家弗屑，雖煩亦復何疵。然劉氏之前，論者已振振有辭矣。班叔度曰：刊落不盡，尚有盈辭也。觀是書者，切磋商之，固不必爲煩者病，亦不得謂點者苛。』浦氏這話甚是。蓋不修邊幅之美，乃自然之極至，非可學而能。至於尋行數墨，吹求律法，總是後人勝過前人。在前人未必受過，而後人所推的，固亦未嘗不是。又如知幾史通敘事篇云：『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又點煩篇謂：『史記吳世家閭閻越世家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案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爲四言，榛蕪若此。』凡此知幾所糾彈於理則是，而於史漢亦未必卽爲大病。又譬如漢書張禹傳本有『絲竹管絃』之句，而王羲之蘭亭序用之，遂有人以爲昭明不錄此序之原因（宋馬永卿嬾真子）此皆於理則是，於原書不必爲損，而在學者則必深守此種格律。

四 字句的格律（下）

本來先秦盛漢經典史籍高文大冊，本不可徒以尋行數墨之文法求之；上篇所述，略資探勝之徑，譬如涔蹄之於大海，非區區略涉之所能盡。六經固來是好，卽史漢之文，亦非可以襲積字句之法，妄爲窺測。如果學者必欲於此效管中之窺豹，則有倪思班馬異同一書，考校兩書字句異同，由之以兼窺遷固之文心，亦未始無補。其書甚不容易割裂，現在不暇詳徵了。

韓愈文中之字句，散文家遣詞造言，至唐韓愈突破羣賢，開啓戶牖，遂爲後此千餘年之宗主。韓之造言，就其鎔舊者而言，無一字無來歷（黃山谷語）此其進學解中所謂『沈浸濃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者是。就其鑄新者而言，絕不蹈襲前人（宗祁語）此其答李翊書所云『惟陳言之務去』樊宗師墓志銘所謂『惟

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竊」者是。就其安置妥帖而言，章吐句適，精能之至，其辭與意適，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亦不能過也。（皇甫湜李翱語）此其樊宗師墓志銘所謂「文從字順各識職」及答劉正夫書所謂「文無難易惟其是」者是。就其警策有力而言，鯨鏗春麗，驚耀天下，衝飈激浪，汙流不滯（皇甫湜語）此其答尉遲生書所謂「昭晰者無疑」及答李翱書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又其送孟東野序所為譏魏晉文章「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者是。

我現在先泛錄前人筆記叢談中論韓文字句者如下，以資博趣，然後舉其三數名篇，詳為推論，以見楷模。

邵博聞見錄曰：「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官克作為駟駟汗闕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

又曰：「宋玉招魂以東南西北四方之外甚惡，俱不可以託，欲風大夫近入修門耳。時大夫尚無恙也。韓退之羅池碑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遠。』時柳儀曹已死，若曰園中於侯或是或非，公論未出，不知遠即羅池之人，千秋萬歲奉誓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儀曹甚於宋玉之悲風大夫也。」

洪邁容齋三筆曰：「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鳴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醴泉而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採於山美可茹，與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之句，煩簡工夫，有不侔矣。』」

又曰：「韓公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

又曰：「宋景文修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佛骨表，潮州謝上表，觀鰓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原云：『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為召，既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前，招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為？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為障字。本言川流橫潰，故障之使東，若以為障於義甚淺，改障前變後為頭後韓公本用狼跋詩語，非謂也。其他以爬羅剔抉為杷羅葵背，油為燒，以取敗幾時為其敗。又吳元濟傳，其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祇不穩當。明年平復一句，悉變之平蜀西川，減西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字，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其節都統討軍，以討為諸尤不然。討者如左，儼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

瑞桂堂藏錄曰：『唐虞夏補云：元初以後，文筆學奇於顧憲成，顧憲成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裏膠膏，未嘗不用字而未嘗見其用字之號，蓋去陳言，足起八代之衰，然或者又謂坐茂樹，望清泉，即覺詞飲石泉，滋味松柏也。』臨輟稿，歸長袖，卽落神揚，輕桂臂，修袖也。昌黎豈肯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耳。按此亦自與原句意味各勝。吳氏林下偶談曰：『退之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蟹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惟麟也不可知。』句法蓋本史記。老子傳云：『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魚吾知其能游，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按此韓及史記二段起訖變化亦各有勝處。』

唐文錄論文章句法曰：『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韓退之與人書，泥水馬弱不敢出，果賴躬親問而以書者，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

楊慎丹鉛總錄曰：『與園揚都賦：聲動地，浪勢黏天。本是奇語。昌黎祖之曰：洞庭漫汗，黏天無壁。』按此遠勝原語。』

本來一個人讀破萬卷，直吐胸臆，當其下筆落紙，鑄新鎔舊，兩無容心，鎔舊而仍非陳言，鑄新而亦非不根。黃山谷與洪駒父書，謂『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此言最爲破的。洪邁容齋隨筆，亦謂『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尙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章摩句寫，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一洗矣。大概凡事出於自得者，必言之有味。吳氏林下偶談，記『葉水心與貧窗論文至夜半，水心自言：『譬之人家觴客，或雖金銀器照座，然皆出於假借。自家羅列，僅破缶瓦，盃然卻是自家物色。』水心於力去陳言之樂，可謂言之親切有味了。現在拿昌黎原道一篇來講，原道開首數語，『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這幾語實學中庸開首解性道教句法，（明蔣之翹韓昌黎集輯注引茅瓚說。）但變化動盪，鞭辟近裏，雖不敢望中庸之渾穆，而在後世可謂顯豁軒昂，當者立碎。『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卽針對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旨而言，而翻騰對陣，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雖不敢望老子之簡嚴，而筆勢夭矯，眞極辨才無礙之觀。此所謂讀破萬卷，此所謂點鐵成金。『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此是化用孟子『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句法，而變『歸』爲『入』，『憂憂獨造』。

（蔣之翹說）以『入』字逗出下文，『入』於彼必出於此，『之』字，草蛇灰線，潛氣內轉，語語有脈，字無空下，雖謂之『不本孟子』亦可。『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此等處尤是眞實本領，能道出禮樂刑政制作之原意。每事以一字括之，灼見要義，贍字通字，濟字長字，次字宣字，率字鋤字，下得萬分穩當，不可更易。（蔣之翹引何洛文說）連用衆多『爲之』字，而不覺重複者，由下諸字句句更換而有有力之意義的緣故。非深知六藝指歸，而又通達人事，何能取鑒經義，自鑄偉詞，以一敵萬，不艱深，不塵腐，顯豁明瞭，入耳動心，至於如此。此是眞才實學，非徒鬬巧於字句者可得比擬，而字句之法，亦未嘗不即推此爲鐵鑄之紀律了。再以畫記一篇而言，畫記雜記畫中人物，字斟句酌，因物肖形，工緻愜當，千古獨步。字字生成，而實字字有本，求造句選字之法，這眞廣大教化主了。其文曰：『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此畫大抵專以摹繪雜品人物見工，錯落有致，而人物之品式裝飾，亦雜陳古今，不拘一格。開首總提此句，以見全神。『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二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搃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騎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凡畫雖雜陳景物，要必有所主，然後衆物有所拱向。此畫以人爲主，而雜畜器物皆依人之動作靜止爲用。故先敘人，然後敘馬，敘雜獸，敘雜器也。其敘人也，自其全部動作之要，及其身手間攜帶之物，與攜帶之種種形態，皆於一句三數字中，配搭恰當，表露如生，而用字之雅切，又是深於經傳訓詁，而安置自然，若皆自造。此又昌黎自謂『凡爲文章須略識字』之說也。如『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一句，『甲冑者』

此人服裝之要，弓矢鈇鉞者，此人所持品物之目，植者，此人持弓矢鈇鉞植立於地兀然不動之神。『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一句，則又寫出動之情態，與夫物之隨身者以何式而見異。吾人觀其所寫，即知此畫盡手之高，所狀之物，栩栩如生，非昌黎亦不能摹傳此畫也。至於獵犬之爲『田犬』，本詩駢鐵『獠歌騎』與禮記少儀『執羈勒』之本禮記檀弓『騎且負』諸句，本易之『負且乘』之句法。『偃蹇』之本論語顏淵篇『寒附火』之本王弼易注『火有其炎，寒者附之』之解。『奉壺矢』之本禮記投壺，如此之類，更僕難數，而用之確切生動，即絲毫不覺爲陳言，亦絕無其他隻字單詞更佳於此者，可以更換。吾上文所云雖鎔舊而仍非陳言，雖鑄新而亦非不根，即此類可見梗概。蔣之翹輯注於進學解『上規姚姒，渾渾無涯』一段下有曰：『世儒評退之文，無如退之自評。文章不本六經，雖生剝子雲之篇，行剽相如之籍，辭非不美，總屬無根之學，故退之必上規姚姒，而始下逮百家也。』云云。蔣氏此語，真知言矣。『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摩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踞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此段速寫馬之品類狀態，尤活躍飛動，令人耳目眩眩而心神愈朗，化工之筆，殆不是過。『牛大小十一頭，蒙駝三頭，驢如蒙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孟簋笠筐筥，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一，皆曲極其妙。』此段總述雜獸器物，又精整如此，又以『皆曲極其妙』一句爲總敘，大力千鈞，畫龍點睛，通身靈活矣。通全篇而言，始也於人最詳，用筆曲折變化，有急有緩。旣而敘馬，則簡速飄逸，若驟雨跳珠，陣勢敏銳，亦以馬之見騎者已因人而見其用，其難於僑人之中動作靜止各異者，即如此點明，已足以托出其形態，其他毛鬣骨相，不能一一盡寫，以免文之煩碎，沒其神也。末段敘述雜獸器物又爲次要，故出之精整綜合之筆，凝然終尾，蒼然後勁。章段前後有重輕，而字句之煩簡緩急即應之也。這篇文章美妙多方，一時也贊述難盡了。歐陽修對於韓公畫記，自愧萬不能及，誠然灼有所見了。

韓文遣詞之美，要非數例可盡。朱晦庵謂其「博極羣書，奇辭奧旨，如取諸室中物。」蓋退之之文，天資學力，兩臻其極。其下字之踟躕滿志，乃由於平日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即如進學解中所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禮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數語實深挾經史文章之心，各以一二字點逗全書，而使通體精神豁然呈露，他人千言萬語搔不着癢處者，昌黎舉重若輕，毫不費力。較之揚雄「法言」所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或問左丘明曰：『品藻。』」那一類的話，雖造語尖新，而意義實不易捉摸者，似猶不可同日而語。學者於此等處多著眼孔，就不難有得了。

方苞所評柳歐以下諸家文之字句，其次柳子厚、歐陽永叔以下，皆肩隨退之，而各極其才者。但他們所爲文，以退之之義衡之，字句之間非必眞隻字不可增減。上文曾引方苞對於柳子厚、歐陽永叔以下諸家之文，皆有刪削字句，以爲學人之法。他這種刪削的地方，見於他的古文約選裏很多。也無從一一徵引。大抵和劉知幾點煩的意思差不多，而注意文義文氣的疵病，較之知幾所點勘，尤爲重要。譬如他說柳宗元封建論篇首「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那幾句話，起勢奇特，而按之無實理。他又將封建論首段「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那幾句刪去，旁邊加了一個字的批，說他「稚」。如此之類，都是推求文義文氣，而定字句之當否，用心很精。或者有譏方氏過事苛求，迹涉無謂者。然方氏本爲善誘學人而設，而吾人今日討論散文字句之格律，利此爲有用之資料，正不嫌其苛求。但亦望學者讀方氏所刪削之文，亦以吾上文所論讀知幾點煩之法讀之，知其於原文不必爲大損，而吾人則不可不守此格律。總而言之，方氏所刪削的，都是去冗，去瑣，去蕪字累句，一切幼稚萎弱無意義不必要之字句，皆刊落無餘，字字切當而盡意，通篇不懈，然後纔能遒健明顯，所謂字句之格律，除此亦無他可說了。

五 篇章的體裁

篇章二字的解釋與其體式之銖裁 我們提筆作文，無論是表達一種意見，或敘述一種事實，說到意思滿足條理完密爲止，就叫作『成篇』。反復申明，層次疊出，藉以達出本篇所欲說的情事，就叫作『敷章』。有章法然後成篇幅。孔穎達《毛詩疏》卷一說：『篇者偏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徧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即是篇章二字之確解。凡一篇文章裏必定包有許多章，這許多章段，即是用以表達這一篇的大意。簡單說來，即是篇必賴章而成，章以成篇爲用，譬如人有四肢五官，人和四肢五官，是相須而成的。所以韓愈答尉遲生書裏說：『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成人即是成篇幅，備體即是有章法。有章有篇，然後纔算成體之文。所以說到謀篇裁章的方法，又可以總括起來，叫作體裁，或體制。體式，體段，皆此一意。凡做一篇文章，要剪裁分配，做成一副很合式的體式，這就是篇章之學了。

劉勰《文心雕龍》裏有銖裁一篇，裏面說：『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規範本體，謂之銖，剪裁浮詞，謂之裁。駢拇之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非夫銖裁，何以行之乎？』贊曰：『篇章戶牖，左右相瞰，權衡損益，斟酌濃淡。』都是解釋剪裁篇章的方法。

篇章之體裁因類而異，亦有因時而異。文章的用處，門類很多，所以他的體裁，也是因類而異。又時代遷流，各類的體裁，也因時而異。蕭統《文選序》裏說：『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這種例子，就是體裁因時而異。文心雕龍，每分別各類文章的體裁，如論說篇說，『原夫論之爲體，』詠碑篇說，『屬碑之體，』檄移篇說，『凡檄之大體，』等等，這種就是體裁因類而異。

照這種分類辨體的眼光，上溯到文學史上的古義，也有可以探源立論的根據。六經中，詩和書是相對的體裁。詩以言志，要嗟歎詠歌，手舞足蹈以達之，所以孔穎達《毛詩大序疏》裏即說：『直言者非詩。』書的體裁則以實寫爲主，所以孔穎達《尚書序疏》裏說：『書者如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明末王夫之的詩廣傳裏對於這種分別

也說得很好。他說：『意必盡而儉於辭，用之於書。辭必盡而儉於意，用之於詩。』簡單的說，即是書以質辭寫實意，詩以腴辭達深情罷了。再到後來，蕭統《文選》序，又將文體分爲『沈思翰藻』和『立意爲宗』二種，這『沈思翰藻』應歸在詩的一系，『立意爲宗』應歸在書的一系。

散文以『立意爲宗』爲其總體式。要之，後世文章的分類，固然是日趨細密，但大概普通的分別不外詩和文兩項。後世詩和文相對而立，即等於古時詩和書的對峙。我們現在研究散文的篇章法度，當然是書的一系而異於詩的一系，即是『立意爲宗』的一系，而不是『沈思翰藻』的一系。

六 議論文之體裁

現在讓我們就散文中各種門類來討論篇章之體裁。散文的門類，大概區分起來，不外論說與記事二種。雖目甚多，而大別總是如此。茲先就論說一類的文章來研究。

散體的議論文和駢體的議論文。漢書嚴助傳說：『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這樣看來，辭章家對於持論，不一定都能擅長。這即因爲辭章家以翰藻爲主，不以立意爲主的緣故。像清代李兆洛推尊駢體，以爲駢體文之指事述意，『能澤以比興，故詞不迫切，資以故籍，故言爲典章。』（駢體文鈔序目）這種話實不足爲憑。凡辭藻之粉澤，和典故之搬用，皆足掩蓋面目，爲指事述意之累。用之於詩，曲成諷諭之意，最爲相宜。用之於文，則徒掩蔽體質而已。譬如梁元帝的鄭衆論，那些『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翰海飛沙，皋蘭走雪』，那許多句法，辭藻故典之美，固十分可愛，但全然是詩的筆意，而於議論文之體裁，實相去太遠了。

議論的體裁異於詞賦。說起論說一類的文章，我們不難立刻就想起賈誼的過秦論。不妨拿來討論一下。過秦論誠然是千古論說文中的魁傑，但是我們對於他這篇論的篇章體裁，要注意一下。要知道他是三篇合成一篇，若專取第一篇，那就犯了昭明太子專取翰藻的毛病了。過秦論本是三篇合成一整篇，賈誼新書分開

爲三段者，因新書是輯合他平生所有的議論文字，分節而存，自成一部子書。譬如他的陳政事疏，在新書裏，不是分爲許多節嗎？所以若單論過秦，這個題目，這三篇文章，每篇只當得一段，合起三段，纔能成一完整的篇幅。但如果割裂一篇來讀，那就是條理不完密，意思不充足了。他這三篇是綜合始皇、二世、子嬰三人，各各爲他說謀。說始皇不明攻守之勢異，二世不知正傾，子嬰不能救敗。他的宗旨是過秦，不是單過始皇。所以三篇連環相屬，萬不可分。（三篇次序依盧文弨校本賈誼新書不依史記，秦、始皇、本紀所引）自從昭明文選專取首篇，後世亦多偏重。不知昭明太子所選，是專以能文翰藻爲主，而不管他的立意的。專以文辭翰藻來講，當然首篇最好。後二篇差得遠。若以意思深刻而論，那就非有後二篇，不能見其剖析之精微了。再者，單就首篇言，他的做法，本非論說文的作法（合起三篇整個的看來，纔是論說的作法），因爲他這首篇完全是體物描寫的本領，是賦家實寫的方法，而不是論家辨疑析理的方法。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篇說：『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正是說他近於詩賦。宋、陳善捫蝨，新語裏也說：『賈誼、過秦，是賦家之經營。』也是這個意思。至於論的體裁，總以文、心、雕、龍論說篇所云：『論如析薪貴能破理』爲正體，拿華腴的辭藻，纏綿的情調，來表現一種抑揚諷諭的作用，那就完全是詩賦的體裁了，所以陸機以下，作論模仿過秦，一步一趨，不但後世散文家向來不取，即便文、心、雕、龍也有嫌他『效過秦而不及』的話。今人章炳麟國故論衡論式篇說：『晚周之論，內發膏肓，外見文采，其語不可增損。漢、世之論，自賈誼已繁穰，其次漸與辭賦同流，千言之論，略其意不過百名。』所見極有道理。不過過秦論終是論說文中一面最大的旗幟；至於模仿過秦的陸機以下，就大差了。清朝方苞古文約選選錄過秦論三篇，後面加有一段批評，說：『古文之法，一篇自爲首尾，此論則聯三篇而更相表裏，脈絡灌輸，史記記者誤倒其序，首尾衝突而不可通。昭明文選又獨取首篇，皆不講於文律。』這個話說得很清楚。後來李兆洛的駢體文鈔一定要改從史記所引，拿末篇做首篇，實在不合。至於曹元首六代論諸篇，所以不及過秦的緣故，李兆洛卻也評得很對。他說：『六代論一氣奔放，尙是西漢之遺，往復過多，言之灌灌。』又說：『陸士衡五』

等論運思極密，細意極多，以此累氣。」他這種看法，本也與散文家的看法大致沒有差別。凡是風骨質健，條理完密，而辭無枝葉的文章，正是散文家所最歸心的。

七 儒家的論（上）

議論文的體裁因家數而異，但論說之文，本皆原於周秦諸子，各人拿自己的學說思想著出書來，以告訴後世的人，所以論說之文，終以中心義理主張之高下，來分別他的價值。儒家縱橫家，名家，等等家數，主張不同，而文理亦各有高下。後世議論家，各就才性所近，發為文章，也終有家數可言，或近於儒家，或近於名家，或近於縱橫家，都可以看得出來的。

儒家議而不辨的家法，先說儒家。儒家本來不尚辨論，處處都講事實。莊子齊物論裏說，「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莊子一書，多通於儒家，莊子之學，原亦本於田子方，所以齊物論這幾句話，可以說是解釋儒家重實在不重玄虛的精神。漢書藝文志也說，「儒家者流，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也是不尚空談的話。凡是拿議論來馳騁意氣，拿空理來爭是非，都是儒家所不愛做的。所以孟子說，「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正是力避好辯之名的緣故。莊子所說，「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照郭向的注子說是，「順其陳迹，擬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實在就是專在事實上陳列妥當，而不以空理爭是非。所以周官考工記說，「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康成注說，「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都是在事實上考求的意思。結果儒家既然專在事實上考求，遇有不得不施議論的時候，也不過把自己的意思，用誠懇的態度，樸實的文辭，正面講出來為止，不肯多逞辭鋒，以炫耀於聽者之前。譬如論語之近於格言，孟子之近於直覺，都是本於這種心理。當然，這種格言直覺的方式，用來持論，在尚文的時候，的確是不利於攻守的；但是我們從他們家法本意上看，應當知道他們所以不肯多逞辭辯的緣故，乃是有所本的。

論語孟子的論理相同相異之點 大抵格言直覺式的議論，在歡喜他的人看來，凡事能從根本上立說；上文所謂誠懇樸實，就是這個意思。對於一切問題，都推到根底上去，對於問題之現階段，不肯敷衍將就，譬如論語季氏將伐顓臾一章，可算論語中最長的議論文，這一章裏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聽了這個話，就立刻發出他的一片道理，所謂『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這一整段，都是他最誠懇樸實的意見。最末，拿『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做他的結論。孔子所說，都是推到季孫根本的錯誤，以爲季孫之憂，恐怕等不到顓臾，爲子孫憂的時候，已經有蕭牆內部的危險了；而對於顓臾固而近於費，這個現階段的問題，不加絲毫解決的方法，所謂從根本上立義，不肯敷衍將就，即是如此。這種格言式的態度，在不歡喜他的人看來，自然就說他迂遠不切事實了，所謂不切事實者，就是孔子意中對於這種格言式的議論，或歡喜，或不歡喜，完全由於聽的人投機不投機，自然人家覺得枯燥不入耳。所以對於這種格言式的議論，或歡喜，或不歡喜，完全由於聽的人投機不投機，但無論如何，近於格言，或近於直覺，內容的條理總要分明，不可汗漫疏漏。譬如孟子一書上承論語之一脈，而氣體更加奔放，但其文中經脈條理，也絲毫沒有紊亂疏漏，或模糊晦暗的地方。所以趙岐的孟子題辭裏說：『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這就是說他的用意和文理之中，本末四圍，皆能周到。孟子是儒家論說文的大宗，內容浩穰，我們無須多論；但他的好辯的態度和論語不甚相同之點，我們也不可不可不認清楚。趙岐孟子題辭裏說：『論語一書爲六藝之喉衿，孟子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隔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我們得趙岐所舉此例，正好用來作一個比較。衛靈公問陳之事，論語的原文是：『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意中，雖是不贊成靈公之用武，但他立言的態度很

誠樸，不執己以非人；但就自己所學與未學兩層來說，不顯斥他人，頗有含蓄；所以不爲好辯；而在論理方面，抱定自己的立場，不爲泛論，也條理嚴密，毫無語病。論語之文，全是如此。孟子答梁惠王問利國，則直排人言，堅伸己見，而下文推論利與仁義之趨勢，又十分雄闊。他的全書也多是這種態度。所以論語和孟子，旨意雖同，而在立言的態度和持論的條理方面，總是有些不同。簡單的說，一個全不好辯，一個就近於雄辯了。這種當然也是時代的關係。但儒家的根本主張，總是重事實的表現，和平心靜氣的敷陳，而不主張與人爭口舌之是非，這一點總是要注意的。宋朝張橫渠、東銘、西銘二篇初作成的時候，原來自己所擬的題目是『乾愚』和『訂頑』，後來程伊川看見了，說他這樣恐怕生出是非爭端，他於是就改爲東銘、西銘，這件事尤可以爲儒家不好辯觀念之表現。

八 儒家的論（中）

儒家雖議而不辯，但亦戒僮侗、荀卿、董仲舒、揚雄、劉向的較論。至於孔孟以後，其他的儒家，像荀子和漢朝大小戴所輯——多半是荀子一派的論文，凡有持論，多半皆是援古證今，正言明志；其內容皆援據有實，而體裁甚直，不加曲論。不過往往頭緒煩雜，綴記增附者甚多，不可以成篇散文論。譬如禮運那一篇，所記皆是極大的議論，但亦嫌零碎，所以孔穎達的正義也說，這篇『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若大學、中庸兩篇，條理最爲整密，是儒家的長篇大論，宋儒把他抽出來，和論孟相並，是家喻戶曉的了。

漢朝儒者揚雄著法言、論語，但論語沒有說不清楚的話，而法言則嫌晦。王世貞、藝苑卮言裏說得好，他說『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脩，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魯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揚雄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這種避達而故爲晦的緣故，大概是由於中心義理上的缺陷，他心中本沒有一段很切實不可少的見解，所以就不能作出切實明爽的文章。宋朝蘇洵曾作了一篇太元論，批評

揚雄頗中其病。他說：『疑而問，問而辨，問辨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這個話甚切當，本來揚雄是專求文章成名後世，漢書揚雄傳說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他專求文名，而立意未必甚堅，所以就難免有浮詞晦語了，我們讀法言，每覺得他說話多僭侗，難明其真意所在。譬如他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這兩句話，雖是我國文學史中的名言，但實在沒有說清楚。所謂『則』究竟是什麼，殊令人費解。論語之文，就不是這樣論語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這『思無邪』一語，較之揚雄就徹底得多。『思無邪』即是『法則』，但空言『法則』而不說出所以然，在義理上爲僭侗，在文義上爲欠完密。要之揚雄法言，在儒家中終是巨擘，但他文義晦澀，差不多是千載定評，不可爲諱。只有宋朝司馬光極力爲他辨護，甚至於說『周公以來，未有若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那兩句話也爲之曲解。』司馬光迂書上說雄說這個話的意思是，以爲『莽自況伊周，則與之，況黃虞則不與也』，其實揚雄的意思，未必是這樣曲折。我們就文字說，他這兩句話，都是犯了文理不完全的毛病。何以周公以來未有若漢公之懿，他並沒有解釋，底下忽然掉到伊尹，又是不以不了了之。像論語裏說：『禹，吾無間然矣。』下文的解釋，是『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何等分明呢？』程語錄載程伊川說：『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所謂蔓衍優柔不斷不決，正是說他僭侗而無斷制，所以學儒家之論說，雖可以正言不曲，而決不可以僭侗。

漢書劉向傳贊說：『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這幾個人當中，孟軻孫況揚雄上邊已略論過了。此外司馬遷應歸在敘事文一類去討論。至於董仲舒劉向等，自然皆是儒家的大宗，凡所論著，也自然皆是精深宏博。但微嫌健拔處稍遜古人，語數固然很富，而不能指畫分明，簡而有要。董仲舒的對策，已經招漢武帝『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評。他這三篇對策，固是儒家議論之結晶品，以文章論，只能說以渾穆見長，而不能明健動人。劉向

的作品，溫文爾雅，獨步一時，而亦有近於平衍散漫之處；其醞藉抑揚處，又近於詩人的意境。王世貞藝苑卮言裏說：『西京之流而東也，由學者靡而短於思，由才者俳而淺於法。劉中壘宏而肆，其根雜。楊中散法而奧，其根晦。』劉向之近於雜，宋朝曾鞏也略說過。曾鞏新序目錄序說：『向不免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簡單說來，學力甚富，而斷制折衷之處少，故多近於平衍了。章炳麟國故論衡論式篇說：『雅而不核，近於誦數；漢人之短也。』所謂誦數者，即是引經據典，書卷極多，雅而不核，即是斷制不甚警策了。至於此後儒家之論如文心雕龍論說篇所舉的石渠論藝，白虎講論，皆是疏解經義的書，可不必與單篇創作之散文并論了。

九 儒家的論（下）

儒家之論力顧本位。韓愈以下漸避本位。儒家之論，本以多說正面話爲主，所以最要緊是顧住本位。清劉熙載藝概裏說：『文有本位，孟子於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則漸避本位矣。永叔則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選懦。至永叔以後，方以避本位爲獨得之傳，蓋亦頗矣。』這個話是很對的。所謂本位者，就是對於自己的正面的主張，務必說得徹底，不是專就旁面側面來生波瀾。譬如孟子答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一章，『何必曰利』是他的本位，所以下文發揮言利之害十分透徹，而對於亦有仁義而已矣一層的解釋，也還是抱住何必曰利的本位而言，毫不放鬆。大旨是說仁義正是可以利國的東西，言利反不能利國而有害於國。何等透徹，至於韓愈的原道，自然是儒家數中之偉作，但略嫌本位不詳了。他這篇原道，是闢佛老之道，而伸儒家之道。然開口即言『道與德爲虛位』，實有自離本位之嫌。因題目既是原道，必定要指出一個惟一的道，而顯出其他的道皆不是道，纔可以服人。乃他斷定道爲虛位，而下文空說『其所謂道，道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又說『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而不知道既虛位，則不妨各執一物以實此虛位；他們道其所道，雖不爲儒所許，而各行其是，似可無礙。所以宋儒程伊川說：『韓愈道德爲虛位之說非

是。『伊川語錄』又他伸述儒家之道，多在生活事態與政教上說，所以前人又說『退之原道，大抵原教』。（明蔣之翹、韓昌黎集輯注原道篇下引）因為儒家談道的書，總應該上推中庸，而中庸開首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韓愈所說，專是禮樂刑政修道之教的一方面，對於率性之道，未有發揮，而道爲虛位，各道其所道之意，與中庸『可離非道』之語，又不相同了。宋朝楊時龜山集中論原道有據中庸駁他的話，大意也是如此。要之，原道文中閃避正面，而泛闊揮斥之筆頗多，宋梅聖俞拿原道裏的話，反贈韓愈本身，他說『愈者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蔣之翹引）也未嘗不是搔著癢處的批評。

歐陽修等以風神波瀾占本位，但這些話，是就理論上追求深處，至於韓文之規模裁體，自然是全法六經與孟子。後世所謂唐宋八家中，本只有韓歐二人，可以說是專門儒家。宋呂祖謙的古文關鍵，是最先提出這八大家之名的總集。呂氏對於這幾家所下的總批評，是『韓文簡古，一本於經，亦學孟子，學韓簡古，不可不學他法度，徒簡古而乏法度，則樸而不文。歐文平淡，祖述韓子，學歐平淡，不可不學他淵源，徒平淡而無淵源，則委靡不振。王文純潔，學王不成，遂無氣焰。此外如柳子厚之文，他以為『雄辯處可戒』，蘇氏父子之文，他以為『不純處可戒』，都不一定全認爲儒家了。他所說韓文簡古而又有法度，即我上章所說儒家之論雖正堂堂而決不可以儻侗，他所說學歐文平淡而不可不學他淵源，即是劉熙載所譏的自歐以後多以避本位爲獨得之傳。因為歐文多以風神搖曳妙遠不測見長，後人不善學之，虛處多，實處少，就成了平淡而無淵源，多就旁面起波瀾，而本位正面之言，不能透徹入骨了。清方苞書歸震川集後說『震川可謂言有序而言有物者蓋寡』也是根據平淡不可無淵源的原則去批評他。

儒家之論亦不可無氣燄。至於呂祖謙所說氣焰一層，也不可不注意。文章明健透徹，就是有氣焰。風骨氣勢都是氣焰之說，那些見地不真，不敢放手立論的人，往往囿圖含糊過去，不免近於氣息奄奄了。從前宋朝陳亮最反對道學，他的上孝宗皇帝書裏說『今世之儒士，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養之人』，陳亮

好爲大言，近於縱橫家。這個話本不可信。清方苞曾告李剛主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這個話，正可以答復陳亮了。（方苞 李剛主墓誌銘）但是我們亦有不可不注意者，譬如自宋元以後，歷代以經義取士。學者造次不離於經訓，似乎這些制科經義之文，應該爲近代儒家論說文之極品了。但事實完全相反，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因爲這些經義多是沒有真切意義和個性的風骨，陳陳相因，奄奄一息，雖有一二大家可以自立，但究竟是極少數。清梅曾亮讀莊子書後裏說：『言之純，義之精，未有如今所謂經義者矣，而豈得爲立言乎？』陳亮所說的風痺不知痛癢，正不妨贈這些經義家。所以無論如何真切的意義和透徹的言詞，是作文的惟一條件。

十 從橫家的論

揣摩與膚言 至於從橫家之論，多半是齒牙甚利，而無甚真理。漢書藝文志從橫家者流篇目下說：『邪人爲之上，詐譏而棄其信。』正是定評。從橫家以揣摩迎合爲立論的宗旨。史記蘇秦傳說：『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揣摩兩字，照司馬貞索隱的解釋，是『揣情摹意』，即是『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這樣說來，他們的立論，完全沒有誠意，不過隨事迎合而已。飛短流長，都是揣摩聽者的心理，利用人家的弱點，一時口舌之便利，所以又叫作短長術。（見漢書張湯傳，主父偃傳）鬼谷子書裏面所說：『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正是這種愚弄聽者的詐術。我們看蘇秦當戰國的時候，想利用合從的局而遊說六國之君，所說的話，各各不同。凡是可以欣動各國之君，壯其膽氣，以成其合從之計的話，無不說得鋪張揚厲，頗爲可聽。但若詳細的追究起來，也都是用躲閃之法，膚殼大言，懈處甚多，不堪一擊。幸而當時六國之君，都是尸居餘氣，沒有一個是有切實經濟的人，所以能聽蘇張一班人大愚弄而特愚弄。至於秦國的人，行事較爲切實，所以就能利用張儀，而不是張儀所能利用的了。而秦惠王之時，張儀與司馬錯辯論伐蜀之事，且不

免爲司馬錯所挫折。戰國策上說，『張儀勸秦伐韓，勿伐蜀，以爲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據九鼎，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爲利。』像這種口氣闊大的話，是他們遊說諸侯處處不離的法寶。但實是一片虛詞濫說，理論極粗浮。細心的人，一看便見破綻。所以司馬錯就提出反對。司馬錯比較能從根本立義，以爲『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今蜀西僻之國，戎狄之長，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利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二國并力，因齊趙而求解乎楚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結果，秦惠王聽他的話，不伐韓而伐蜀。得蜀之後，秦益富強。我們看司馬錯也未嘗不是爲秦求王業，但他先爲根本富強計，不欲冒昧從事，本此立論，自然堅實得多。張儀一片疏闊欺詐之言，不得不退避三舍了。明朝林西仲說，『張儀爲王業起見，語雖大而實疏；司馬錯只拏定富強二字做去，而王業不爭自成，何等萬全。優劣判如指掌。戰國中求實落經濟，無出司馬錯之右者。』評得甚切。所以說從橫欺詐之言，經不得切實的追究。劉向的戰國策序，頗原諒這些從橫家的苦心，以爲『當時君德淺薄，爲人謀策者不得不度所能行，爲一切之權。』劉向這話，是立言忠厚，其實蘇張這些人並沒有真爲人謀之心，一切都是利用愚人之所長而不用其所短罷了。宋曾鞏戰國策目錄序裏就很以劉向此言爲然，以爲『以前歷代帝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戰國遊士則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僞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欺，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曾鞏這段話，說明戰國從橫之士不但非真心救世，而且是僞心自便，不管六國之利害，對六國之君的本身，也並非忠實。我們就文章言，正因爲從橫家不忠實，所以他們的的文章就不免浮夸泛濫而少樞心之。

美。後世凡有徒騁浮詞，虛張聲勢，專擺空架子，而按之無甚精意之文，雖號稱儒家，而實近從橫。呂祖謙所說蘇氏父子之不純，正是關涉此點。

十一 名家的論

詞是理達與兩可之說。此外名家之論，也是論說文中一大支派。章炳麟國故論衡論式篇裏，頗主張這一派的論。他說：『凡立論欲其本名家，不欲其本從橫。』他以為名家『精微簡練』，不本名家者，多好爲『廣居自恣之言』。他極力推崇魏晉人的論，以爲下軼唐宋，上越兩漢。由於魏晉人之持論，核實精微，近於名家的緣故。章氏這些話，我以爲一半是對的。一半是不對的。立論必求其核實，切忌雜有從橫家廣居自恣的習氣，這個意思誠然不錯，但若一定認爲名家之論高於一切，那就恐怕不能使人心服。因爲名家的最大流弊，是『話雖說得是，而理不是』，言辭雖若無破綻，而理論實不可通。這是自來對於名家的定評。莊子天下篇所說：『惠施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又史記自序載司馬談所說的『名家苛察纖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檢而善失真』，又孔叢子所說：『平原君謂公孫龍辭勝於理，孔子高理勝於辭，辭勝於理，終必受屈』，又漢書藝文志所說：『名家者流，託者爲之，則苟鉤鈎析亂而已』，都是這個意思。

例如孔叢子公孫龍篇說：『公孫龍言臧三耳甚辯，析子高不應，明日平原君曰：『嚙昔公孫龍之言信辯也。答曰：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實非者乎？平原君不能應。』謂公孫龍曰：『子勿與孔子高辯，君辭勝於理，終必受屈。』說人有兩隻耳朵，本是很易知，很順耳的話，公孫龍一定要詭更名實，故作難曉之言，這又何必？他這三耳之說，和他所說的雞三足、牛羊各五足（見公孫龍子通變篇）是一樣的話。他的通變篇裏說：『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宋謝希深注曰：『人之言曰：雞有足，牛羊有足，則似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

二，並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雞三足。）凡此種種，都是虛詞巧辨，故爲深澀。如果要駁他，並非難事。卽拿普通平易近人之言，都可以打倒他的。譬如他的白馬非馬論，不是經孔子高駁倒嗎？（見孔叢子公孫龍篇）公孫龍以爲『白馬非馬，因爲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當與，求馬則黃黑馬可致，求白馬則黃黑馬不可致。今黃黑馬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白馬，則白馬非馬明矣。』這些話見公孫龍子書中，言辭甚繁。大意都是循名責實，極其深僻的意思。但是孔子高說，『春秋記六鷁退飛，視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視之則見其白，察之則見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布，縑素青黃色名雖殊，其實一也。是以詩云素絲，不云絲素。禮有緇布，不云布緇。』這個意思，豈不是人人易曉嗎？假如照公孫龍的話，循名責實，反而混亂名實，對於世間事，反有極大的流弊，而且也萬難使人了解。桓譚新論裏說，『公孫龍常爭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可見得這種虛論難見諸事實了。又名家的鄧析，子好爲兩可之辭，兩可之辭，也卽是所執全無定理，但求言詞上各方面都無破綻，足以禦人。列子力命篇說，『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子產誅之。』我們看列子楊朱篇說，『子產治鄭國，而兄公孫朝弟公孫穆舍百事而溺於酒色，子產以爲戚，造鄧析謀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喻以性命之重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言告兄弟。朝穆曰，吾擇之久矣，奚待若言而識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執念哉？而欲尊禮義矯性情以誇人，吾以爲不如死。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而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於天下。子產無以應，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乎？鄭國之治偶爾，非子之功也。』假若列子的話是可信的，那末，鄧析這樣兩可之辭，難怪實心任事的子產不能容他了。（殺鄧析左傳定公八年所記，是駟黶的事，不是子產，不過我們但就列子所舉的理論來講，不必論鄧析突爲何人所殺。）後世凡有但顧詞鋒銳利，不管於心安不安，都犯了名家的毛病咧。

十二 魏晉本名家的論

清談名理的論說 至於魏晉六朝的論，雖可以說是本於名家，但和古名家實不相同。我們一講到魏晉六朝的時候，自然會想起那個時候思想來源之複雜。文心雕龍論說篇已經把那時候的言論思想分析得很清楚。他說：『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這些論說，因為思想來源之複雜，自然都離了儒家的論體。好尚清談，推崇口辯，以清辭名理相誇耀，根據這些心理所成的論文，當然是辭致極美了。但於理亦未必恆心，關於當時這些論說上的故事，世說新語文學篇載得很多。那時候一班名士，多歡喜著論以資談助。賓筵客座，以俊語見排調，而實無真是非。那時候一些有名的論文，即是傅嘏、鍾會的四本論，何晏的道德二論，裴頠的崇有論，稽康的聲無哀樂論，養生論，歐陽堅石的言盡意論，以及王弼、郭向、阮籍等之所著，都是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當時膾炙人口，極文字欣賞之樂。但是文心雕龍評得好，他這論說篇，對於魏晉以來這些論說，以為『固是獨步一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所謂『徒銳偏解，莫詣正理，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即是我上文所說『辭是而理不是』的意思。本來在那個時候，清談的風氣之下，大家說話，無不講究極端的漂亮，以口舌禦人。至於真理是非，實無人過問。世說新語言語篇載『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王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支通一義，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忤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辨理之所在。』又記王羲之之勸告謝安說：『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安回答說：『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我們看謝太傅這句反駁的話，在言辭上，如何能說他不漂亮呢？但在理論上，豈能令人心服？又譬如稽康的那些論，固是自居有極精的理論，但實在他本身對於這些理，也未必能體認真切。既說聲無哀樂，聲是無常，又何必於臨終的時候，歎廣陵散之成絕調呢？又譬如王導平日最愛談稽康這些論，但也無非資爲談

助，並非有資於事理。世說文學篇說『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當時一班的人，清談雅辨，都彷彿各人必備有一種枕中鴻寶，所以王丞相就熟玩這三篇論，以爲資座雅談之資助。這個時候，對於論說文的觀念，已經大變自古以來的風氣。像孫權終身服讀過秦論（三國志闕澤傳）這種意思，都已經沒有了。從前漢武帝以辭賦家爲俳優，六朝的論說家，也似乎被人看作俳優了。論說變爲俳優，未免大離論說的本體，可謂我國文學史中一個大變化了。所以六朝的論說，按照我國周秦諸子的流別來講，固然不合於儒家，也不合於其他諸子的家數。因爲周秦諸子，雖家數不同，而其言論，多少皆是有關於實事實理的（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所云『皆務爲治者也』）而六朝的一班論說，則但是戲論。章炳麟謂那時候的論說本之名家，嚴格講來，似乎可以說他擬於不倫。我們看公孫龍子在戰國的時候，本是鑒於當時名實淆僞，賞罰混亂，想以嚴格正名之論來救世之弊啊。

李兆洛駢體文鈔裏對於稽康養生論那一類文章，有兩句批評，他說『此等文自論衡出，時有牙慧可取。』這個批評很對。我們看魏晉這些論，都是未嘗無牙慧可取，但未必實當人心。

十三 敘事文的體裁（上）

敘事文三要件，信，有序，動觀感。作敘事的文章，有三種必要的條件。第一要『信』，第二要『有序』，第三要『動人觀感』。若上推之古義，『信』即是『疏通知遠而不誣』，（禮記經解所言書教）『有序』即是『屬詞比事而不亂』，（經解所言春秋教）我國記事文之最高最美者，莫如尚書和春秋。所以關於作敘事的文章，有這兩部書已經爲我們開出無限的法門。至於敘事文的根本目的，是不待言要使人看了有所動心。無論所記的事是表彰好的一方面，或是實寫壞的一方面，都必定要使讀者對於所記之事，有深刻的印象。像孔子所說『帝典可以觀義，大禹謨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志，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

以觀誠。《尚書·大傳》就是尚書所給人的觀感。孟子所說『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篇》雖是古話，亦即是春秋所給人的觀感。所以要求這第三種條件，也應以這兩部書爲極則。敘事文以能否動人觀感爲其價值之標準。所動的觀感愈大，他的價值亦愈高。亦如議論的文章，無論說得如何好聽，而終以立意之高下爲其價值之標準，情形是一樣。但這三種條件不可分離，是相需而成的，能信而有序，即不難動人觀感。凡能動人觀感的必是信而有序。

傳信傳疑之實錄與繁簡之剪裁 先講第一種條件（信）。凡執筆記事，其材料的來源，約有三種：或得之遠年之傳聞，或得之負責者之見告，或得之親身之聞見。遠年之傳聞，即明據故書雅記，以見信，故書雅記所未言，不可妄事臆測。親身之聞見，即明據耳目所及以見信。耳目所未及，不可妄事臆測。春秋書法，有所謂『疑以傳疑』，信以傳信，著以傳著』（穀梁傳·桓公五年，莊公七年）就是對於這三種材料來源之處置方法。司馬遷的史記，是尚書春秋以後最好的敘事文。當時劉向揚雄已一致推服，說他這書可當得實錄二字。（漢書·司馬遷傳贊）『實錄』即是『信』，即是能够『信』以傳信，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所以晉范曄亦拿『實錄』二字，來注釋穀梁傳上這幾句話。史記每篇論贊中，自己聲明取材之來源，傳疑傳信之苦心，幾乎篇篇都有，不可勝引。總其大概言之。於遠年傳聞之爭，據六經及孔門之傳述，於近代之事，本之父執師友之見告。於當時之事，本之親身之聞見，而又以游歷四方耳目參證之所得，經緯於其中。所以這部書，不愧爲最佳之實錄。至於其中所有疏闊的地方，亦正是他謹嚴傳信不肯妄加增損的地方。史記立後世敘事文之極則。後世凡有能本著他的方法去作敘事文的，無論形式外表上如何不同，都可以成爲佳作。自來論者多以爲史記之後，漢書以詳瞻見長，三國志以高簡見長。這種話實是皮相之談。難道司馬遷不能爲班固之詳瞻嗎？難道班固不能爲陳壽之高簡嗎？其實他三人不過各行其是罷了。史記所包括的時代遠而長，漢書所包括的時代近而短，近而短，所以就能以詳瞻見長了。至於三國的時候，情形又甚不同。三國紛爭的局面，事實之傳說，人物之是非，皆極混亂，正式確實的史料，

很不容易獲得，像當時蜀國，就根本沒有史職。三國志、蜀志、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詳靡聞。』對於這種史實材料紛亂抵牾之時代，記述者爲求慎重起見，自應以簡嚴爲主；不然，像裴松之注子裏面所引雜書小說那樣豐富，難道陳壽會沒有看見嗎？陳壽正因爲看見那些雜書小說，踏駁淺陋，不足爲憑，所以纔不取他。若是照這樣說來，司馬遷若換作班固，也必定能爲漢書之詳贍；班固若換作陳壽，也必定能爲三國志之高簡咧。

但以上所講對於信字的這一種條件，不過僅僅說到一部分，很容易了解的一部分。根據材料之有無多少來傳信傳疑，豈不似乎很容易麼？如果專照這樣講來，司馬遷又何必定爲千古的文雄？後世史家又何必不如馬班、陳范呢？所以信字條件之另一方面，不可不講。本來敘事文雖說是以信字爲第一步條件，這個信字實不容易做到，雖是以材料事實之有無多少爲標準，而非專以此爲簡單的標準。顧亭林說得好，他的日知錄卷十九說：『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這個話說得真好，就是說史記雖簡，漢書雖繁，但史記有繁的地方，必非漢書所能及；史記非不能繁，而且他的能繁之才，尙過於漢書。他的能簡之才，更是漢書所難望及，所以這樣看來，繁簡之外，尙大有事在。』

傳真與從是，所謂繁簡以外的事，就是要能够『傳真』。所敘述的言行事跡，一定要力求符合原來的情况。王世貞、藝苑卮言、會說、史記、帝王本紀中，不應該改尚書諸經之語句。（他說：『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修，而意則主於達，今諸經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太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非聖人意也。』』這個批評頗有理。因爲史記雖以訓詁字易本字，求其易於了解，但頗失原來渾穆的神氣，和簡嚴的節奏。易於成爲散漫平衍，沒有精神。例如堯典開首幾句，『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幾句，照古韻家說，都是叶韻的。我們看他聲調何等鏗鏘。史記改爲『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就失了節奏了。但這種還不過是文字上兩可之事。如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驩兜曰：『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史記把堯所答的兩句話，改爲『吁，頑凶，不用。』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就覺得散

漫無精神，不及原來語氣之深嚴了。又譬如『肆觀東后』他改爲『遂見東方君長』，此亦失真。經典上君長兩字連言者甚少。古時泛稱人君皆曰后，尙書所見多是。稍後見於春秋左傳裏泛稱人君多曰君。這都是一時一時的習慣語，未見有連稱君長者，應該一切從原文。況且君長二字重複，亦失於太隨便。『觀』字是體制上的專名，『見』字亦近於隨便了。這都是失真。不過史記這種古帝王紀，本是重在整理古書上的傳說，加以解釋疏通，本不必如此吹求。然而我們專論文義，正不妨如此觀察。至於戰國秦漢以後，太史公自作之列傳世家，那就完美到極點了。

人之言行動作，各有體態，會通其大禮觀之，自有不能相易者。又有時代與事勢之不同，古今異宜，彼此各有面目，斷不可隨意假襲。三國志魏武紀裴注中，引孫盛魏氏春秋說魏武答諸將曰：『劉備人傑也，將生憂寡人。』裴氏不以爲然。他說：『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易舊文，後之學者，何所取信。且魏武方以天下勵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類。』左傳哀二十載，吳王夫差使謂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次年越滅吳，夫差縊死。史通言語篇也說：『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叱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罕能從實，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僞修混沌，失彼天然。』這裴松之和史通所說的，都是力求敘述之傳真，極爲有見。清梅曾亮有答朱丹木書說：『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言言於此，雖事之甚微物之甚小者，而一時朝野風俗好尙皆可因吾言而見，』也是同樣的立論。像蘇軾表忠觀碑文章固極好，但篇首『臣忤言』三字摹倣李斯上書的體式，而非宋朝當時公文體式，即是犯了好古而失真之疾。章學誠文史通義已抉發其病了。像韓愈的平淮西碑，雖胎息甚古，而實未襲用古時的成語。李商隱說他『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民生民詩』，實說得不對。前人已評論過了。即便後世小說傳奇家，描寫事情，都須注意於此，高下之分，多以此爲標準。所以清李漁曲語裏說：『說何人肖何人，說某事切某事，說張三要像張三，難通融於李四。』他又舉例說：『玉簪記之陳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

在禪堂打坐，其曲云：從今孽債染縑衣，禪堂縑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吾於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長最大而尋不出纖毫滲漏者，惟水滸傳一書。他舉例甚多，關於敘述言行之傳真方面，精論甚多，頗可參考。有事實的敘事文，和小說戲曲本不相同。小說的材料或得之道聽塗說，街談巷語，或出自本人之臆造，其來源皆不足爲憑，徒供人一時快意玩好。但其技術之高下，關於能否傳摹真情恰如分際，無過無不及者，都有如此之大，何況有事實之敘事文。

搬弄辭藻之失真 至於駢儷家之敘事，好用典故以點綴當前之事實，饒侗含糊，尤不能傳真，實不如散文質樸之敘事來得清楚。在駢文本本身是自成一格，若作散文亦採用這種敘述法，那就大不可了。章學誠文史通義裏古文十弊說：『敘事敘言，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事，適如其言。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熊丸？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闡行皆如刻印，與其文而失質，何如質以傳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起於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又文人之通蔽也。』章氏這個話可謂十分痛切了。

傳真不計繁簡 再者，欲敘事文之能傳真，又必求事實之安排得法。蓋事實之安排與取捨，必以事實之必要件爲標準。例如趙翼陔餘叢考說：『史記、淮陰侯傳、全載蒯通語，正以見淮陰心乎爲漢，雖以通之說喻百端，終確然不變；而他日之誣以反而族之，冤痛不可言也。班書則韓信傳盡刪蒯通語，而另爲創作傳，不知通本不必立傳之人，載其語於淮陰傳，則淮陰之心跡明，而通之爲辨士亦附見，且省卻無限筆墨。班氏因此語爲通立傳，反略其語於淮陰傳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輕，宜乎後代之史日繁也。』像這種事實分配去取之用心，尤其是敘事家所最應注意的。蒯通之語，必載淮陰傳中，始可以見淮陰之真，與漢高誅絕功臣慘刻少恩之實狀。淮陰傳雖以此而見繁，而實傳真所必要，刪蒯通語於淮陰傳中，而淮陰之精神，因而不顯。淮陰傳雖去此而見簡，但不覺失了傳真之要素了。所以顧亭林所說繁簡非論文要義，史記之繁處，必勝漢書之簡處，正是這些道理。所以

照這個例子推廣看來，作者求能傳信傳真，必對於事實之安排要大費心思，不是可以隨便揮掉的。材料雖可憑，而不善安排也是不能傳真的。敘事家能將以上數義切實遵行，那就對於信字這一條件，可以差告滿足了。

十四 敘事文的體裁（中）

以天然事實爲次序 敘事文第二個條件是『有序』。本來立言必須有序，不限於敘事文。任何文體皆然。但敘事文是要將複雜錯綜的事實用客觀的眼光將他表達出來，較之主觀的單純自吐意見的議論文，尤以秩然有序爲最重要之一點。但敘事求其有序，又實非難事。有天然呈露的事實，已經爲我們鑄就了現成的模型，我們的文章，如能恰合這天然的模型，那就自然成爲有序的文章。換句話說，即是倘能將事實之經過觀察得極清楚，成竹在胸，六轡在手，然後提筆運載，自然就能夠恰到好處。

凡對於事實經過之觀察，必注意其始終本末，與其旁面側面的連帶關係。將說事實之正面，必先敘事實之前面；正面既明，餘波結果也要補足；旁面反面連帶的關係也要隨手說明。春秋穀梁傳所說『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莊十七年）又每說春秋因要書某事，不得不連帶書某事（如成十五傳謂『因葬共姬不可不書葬共公』杜預注左傳處注明某事爲某事張本，如開首惠公元妃一段，爲隱元年不卽位之張本）與某事所以終某事（如補敘哀公十四年以後之傳，所以卒前事）某事所以窮某事之枝葉（如隱九年注）都是說明敘事者攝取事件之本末枝葉經營完密之用心。

主幹與枝葉 總而言之，作敘事文的技術，不外先立主幹而後順幹鋪敘；鋪敘所及，或追捕一事，或旁帶一事，或反襯一事，皆是見有必要，隨手生枝，枝幹交榮，就蔚然成樹了。大抵敘事文的主幹，不外三種。一種是以一個時代之首尾爲主幹，如尚書中之堯典（從今本合舜典）春秋左傳及史記中三代周秦之本紀皆是一種，是以某項事件之始終爲主幹，如尚書中之禹貢，顧命，後世史部之紀事本末，以及後世文集中如曾鞏之越州趙

公救災記之類皆是一種是以一人之生平爲主幹，如正史之列傳，及文集中傳狀墓誌等皆是。（真西山文章正宗）對於敘事文是這樣分類，甚爲得要，凡文章的分類，實應以內容爲別，不應徒以外形爲別。這三種主幹不同，其敘述的方法，經營條理疏密繁簡，也自然隨著主幹而有差別。譬如以一時代爲主幹者，自應疏舉大端，以一事一人爲主幹者，自應曲表細微。但這三種敘述體式，雖有不同，而實在講起來，皆必以充實這個軀幹，首尾枝葉正反四面，無一可缺爲共同之目的。例如堯典若不敘舜事，則唐虞相授一代之治功未竟，是謂有首而無尾。左傳若不始敘惠公之事，則隱公攝位之來歷不明，是謂有尾而無首。禹貢若不旁敘各州之土壤草木鳥獸風土，則禹之因地宜制貢法之原委不明。左傳若不隨時雜採瑣聞佚事，言語文辭，以傳翼正事，則事件之旁側因緣不顯。史記老子列傳，若不以韓非爲反襯，則老子之爲深遠，不能顯白。孟子荀卿列傳，若不連敘鄒衍公孫龍墨翟等以反形孟荀，則孟荀之可貴與孟荀所辭而闢之之對象不明。凡此各種篇章體段，肥瘦廣狹，雖各不同，而各具之五官四肢肌膚筋絡，其理皆無絲毫之差別。所以吾人提筆作敘事之文，不論題目如何，苟能對於所敘事件，或所敘之人物，深察其條理原委，於事之直接間接之關係，正面反面旁面側面之現象，一一攬其端緒，而忠實底敘述出來，則未有不能成爲極有序的敘事文了。總而言之，文章中一切的波瀾，皆有自然的定理。歸有光評史記說：『史記如水，平平說去，忽遇石激將起來。』又茅坤評王安石的給事中孔公墓誌銘說：『於序事中一點綴，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應接不暇。』二人之言，最能形容敘事文的骨法。順流平平，即是一篇通體的主幹。遇石而激，隨事點綴，即是隨宜而生的枝葉。識得此意，其他一切瑣瑣論文之言，皆可以自悟了。

十五 敘事文的體裁（下）

於重輕濃淡中見生意。至於說到第三種條件，動觀感，那就不是專門外表形式上的事了。文章能動觀感，必是內容充滿了情味的文章。所以欲動人之觀感，必求敘述之有情味。凡文不佳，皆由於無情。在主觀發表胸

襟的文章，比較還容易見情味。至於客觀的敘事文，就比較難了。敘事文求有情味，有二種必須的條件：第一要識得重輕，第二要置身境中。所謂識重輕者，即是當重的要盡力描寫，當輕的可從輕描寫。有加倍渲染之筆，有輕描淡寫之筆。兩兩配帶，自能使人觸目動心。若一片平庸，如刻板的圖畫，如帳簿，如算子，則萬不能使人看了有情味。譬如史記項羽本紀，專記項羽生平，全篇共一萬字左右，而於鴻門宴一事，即占了一千二三百字。其他鉅鹿之戰，和烏江之敗，亦皆盡力摹寫。以這三處都是極能見項羽之為人，又是極有關係之大事。所以加倍渲染，使聲情如見。清曾國藩曾說：『項羽本紀如此長篇，實只專紀一事，古今罕有，讀之絲毫不覺其長。』所以如此，即因他內容敘述有重有輕，生氣勃動，毫不刻板，所以令人不厭。又譬如史記管仲傳，全篇一千字之中，敘管鮑交情處，即占了二三百字。亦以此為管仲一生最要之事，所以特別加寫，使讀者讀此，朋友之感，油然而生。其情味深長，皆是由於敘述的方法能分別重輕的緣故。

敘述有情，置身境內。至於所謂置身境中者，即是作文者如欲使讀者生情，必先求自己有情。蓋敘事者，必先對於所敘之事件，用一番冥想的工夫，彷彿身入該事境之中，喜怒哀樂，感同身受。如此入而復出，寫了出來，自然所寫之事談笑皆真，躍然如見了。如果所敘之事，是自己親身耳聞目見得來的，那末，本著當時所受的深刻的印象，寫了出來，本來很容易見情味。但即使所敘之事，是傳聞得來的，或載籍遺留下來的，亦必先設身處地冥想一番，以揣摩那事件的真面目，然後下筆書寫，驅遣材料，也自能倍見精神。譬如司馬遷在屈原傳，贊裏自己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他對於屈原的平生心事，先有一番體貼入微的觀察，所感極深，所以他的屈原傳能寫得那樣好。又他在晏子傳，贊裏自己說：『假令晏子而在，吾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他對於晏子，也是有一番深刻的想慕，所以晏子傳也寫得那樣好。此外司馬遷一肚皮的鬱積悲憤之情，遇有足以發洩之處，如伯夷傳，貨殖傳，遊俠傳，皆非常有精神。皆由於他平日對於這一類的人情世故，熟爛於胸中，早有一番沈痛深刻的思想的緣故。

情感與意趣 但是我們還要知道，世間可以動人情感之事，不知有幾千幾萬種，而一種事件所招的情感，則人各不同，不能一律。或此人對此事有情感，而對他事無情感。而對於同一事件，或此人之觀感，與彼人之觀感，各不相同。大抵人人各有興趣上所獨到的地方，而對於同一事件之觀察，實多因平日意趣所殊而生差別的感想。每見同此一人一事，而幾個敘事家的敘述，人各不同。即因為各人意趣有殊，所以對於同此一人一事，所觀察所注意的，各有所偏重。於是對於材料事實之取捨，布置經營，自然也不免各顯手眼，不相符同了。從前有人說，史記敘遊俠則見精神，述聖賢便無氣象；這個批評，正是對於司馬遷的胸中意趣，加以分析。司馬遷的意趣，本是好奇的方面居多，敘遊俠尤見精神，即是這個緣故。拿他和左傳比較起來，意趣之殊，也可以看得出來。例如管仲這個人，照史記所敘，只是一個才人；但如果照左傳所敘，則完全是一個篤實守禮的人，意趣相差甚遠。這自然也是由於二家各有注意之點，因此關於材料之取捨，不免有純駁之分。所以這樣說來，文章之高下，固繫於情感之有無；但是有了情感，尚不是區別高下之最終標準。高下所分，最終的標準，還在於意趣。